

改革開放
30年作品選書系

改革開放30年 散文選

主编 孫顥
本卷編選 吳泰昌

上海文艺出版社

改革开放 30 年作品选书系

改革开放 30 年
散文选

主编 孙颙

本卷编选 吴泰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 30 年散文选 / 孙颙主编；吴泰昌编选。—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11

(“改革开放 30 年”作品选书系)

ISBN 978-7-5321-3402-1

I. 改… II. ①孙… ②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4723 号

出 品 人： 郑宗培

责 任 编 辑： 韩 樱

封 面 设 计： 袁银昌

改革开放 30 年散文选

孙 颰 主编

吴泰昌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lcn.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8.5 插页 2 字数 410,000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02-1/I · 2587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总 序

回 归 之 路

孙 颖

1979年，新年的钟声响过没多久，首都北京还被隆冬的严寒包围着，在静悄悄的友谊宾馆，文学界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说它非同寻常，因为会场上出现了一批消失已久的面孔。王蒙、陆文夫等人，曾经像流星一般闪过天空、二十多年没有音讯的作家，竟然又汇聚一堂，开始高谈阔论文学创作。天气似乎真要变了，隐约可以听到春天的脚步正在逼近。

那年，我还是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有幸参与前辈们的盛会，实在有如临梦境的快感。那时候，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冬》，冒昧地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竟被接纳，所以才获邀请参加此次意义深远的会议。那几天，我幸运地和陆文夫先生住一个套房，朝夕相处，聆听教诲。他在人生苦难中凝聚的智慧，在随意的交谈中，缓缓流进我的心田，让我长久受益。痛心的是，前两年文夫先生已经离我们远行。

会议召开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结束不久，中国大地上的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生活巨变已经开始，但是，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屠岸等敏感地行动起来，他们召集的这个中长篇小说座谈会，是文学界响应三中全会号召的重要举措。参加会议的作家们，互相激励，生命之火重新燃烧，很快写出了一篇又一篇震撼读者的作品，是新时期文学百花园的首批耕耘者。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这套三十年作品选，在选目中我看到好些当年与会者的大名，因此引出了这番回忆。

我细细回味着入选的作品。很多篇章，我读过不止一回，回想当年阅读的情景，时而激动得难以掩卷，时而伤感得双目湿润。这次不一样

了,我以小结历史的眼光,比较冷静地比较分析入选的作品,当然,同时联想到许多没有入选的优秀作品。一套选集,篇幅限制,自然无法兼顾一切,何况是面对创作爆发年代的丰盛积累。回顾的结果,让我渐渐脱离开单篇作品长短的评价,而沉思、沉吟于三十年悠长的文学轨迹。

这是一次坚决的回归,向文学本义的回归。

首先,是向大地的回归,向泥土一样朴实、敦厚的生活的回归,与长时间统治文坛的左倾教条划清了界限。最早震撼广大读者的作品,短篇像《伤痕》、《陈奂生上城》等,中篇像《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其深深打动人力量,首先源于此处。我们曾经读过太多的漂浮在天空白云间的作品,英雄人物高大完美,不食人间烟火,没有私情欲望;周围的世界也黑白分明,正义毫无悬念地压倒邪恶。那样的作品,美丽单纯到仿佛勾勒在宣纸上的清凉世界,与芸芸众生扎根于大地的日子实在相隔太远。所以,当上述描绘平凡世界的作品问世,特别是深刻反映“左”的长期危害带给人民的无数灾难时,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还应该指出一点,在解放思想最初的日子里,文学界是走在前面的,很多必须冲破的思想樊篱,是作家们以形象和感性率先提示给社会的。因此,创作的影响力就突破了常态下的文学作用范畴。现在,有人时常感叹读者对小说的兴趣大大不如二三十年前,那是忘记了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

其二,是向“文学即人学”这个本义的回归。当小说从蓝天白云回归大地泥土之后,作家们很快明白,世间的问题纷繁到绝不是小说能大包大揽的。比方说,过于抽象的理论思想问题就得托付给学术界。小说最擅长的,还是展示人的喜怒哀乐,表现人的悲欢离合,其中难度最高也最见作家功力的就是把握人深邃的内心。因此,作家们的关注力,从社会热点更多地转向人的生存与发展。说到这里,我们马上会联想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出现在文坛时,生疏已久的对人性的深刻披露,确实让我们兴奋不已。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其他各种风格的研究人的小说,像《棋王》不动声色的激情,像《没有纽扣的红衬衣》飘逸潇洒的刻画,像《叔叔的故事》入木三分的剖析,像《民谣》冷峻苦涩的笔调,等等。

其三,是向创作个性的回归。这是在向文学本义的回归上最辛苦

的努力,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前辈大家的作品,我们不会搞混,鲁迅和茅盾的小说,巴金和老舍的作品,你不看署名也分得清楚,原因就在于个性清晰,作品具备充足的独创性。当文学越来越多地被“左”的倾向压抑,作家的个性也就成为打击批判的对象。作品的思想主题,抄报纸社论;作品的人物塑造,按“高大全”模式套裁;作品的表现手段,以保险第一作为选择的前提。于是,个性化自然离我们远去,甚至让人觉得是相当陌生的事情。新时期文学爆发后,一些作家,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率先显示了强烈的个性。老作家中,王蒙的个性获得公认,那以作家的智慧凝聚成的天马行空式的表达力,在本次所选的《蝴蝶》中也有充分的展示。在中年、青年作家中,均可找到这样的典范。不过,我们需要承认,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在此点上还有距离,个性模糊、独创薄弱,已经成为必须重视的大问题。即使在最基础的创作要素——文学语言方面,个性化不足也成为突出的现象。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的写作作者们不屑用功于此,把大白话(乃至粗俗的语言)误以为生活化了。因此,在向创作个性回归的征程上,路漫漫其修远兮。

本套选本,除了小说,还有散文,上面的感想,主要是小说引发的,但是也和散文有关,发展的轨迹是相近的。

回顾的目的不仅仅是小结昨天。为了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我们将继续前行。

目 录

总序 回归之路	孙 颛	1
把心交给读者	巴 金	1
愿化泥土	巴 金	6
平原的觉醒	孙 犀	9
团圆	柯 灵	13
油海荡舟	曹靖华	19
等待	冰 心	23
绿的歌	冰 心	25
工作着永远是美丽的	陈学昭	27
太湖秋	艾 煒	32
可爱的故乡	茅 盾	36
小鸟,你飞向何方	赵丽宏	38
丁香花下	黄秋耘	43
瀑布之歌	冯 牧	47
家乡的阁楼	赵翼如	54
梨花,雪白的梨花	姜德明	57
书桌	冯骥才	61
山泉水暖	碧 野	67
又临黄河岸	高 缨	72
昆仑礼赞	刘白羽	76
丑石	贾平凹	80
鼓声	萧 乾	82

匡庐八月	江 波	85
东京夜话	何 为	90
莼鲈之思	黎先耀	97
黄花滩	菡 子	100
霜叶	丁 宁	103
唱给豆腐的颂歌	忆明珠	108
枯叶蝴蝶	徐 迟	112
前门箭楼的燕子	黄 裳	114
雄关赋	峻 青	117
紫藤萝瀑布	宗 璞	123
蓬莱的童话	杨羽仪	125
木偶的悲喜剧	韩静霆	129
桃花源记	汪曾祺	138
河,就是海?	王英琦	142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严文井	146
生命犹如乐章	徐开垒	151
江上	黄永玉	154
曼哈顿街头夜景	丁 玲	157
忆白石老人	艾 青	159
红红的小辣椒	吴泰昌	165
读沧海	刘再复	169
火箭总设计师速写像	钱 钢	173
破冰船在破冰前进	秦 牧	177
离合悲欢的三天	田 野	182
巩乃斯的马	周 涛	189
遗嘱	黄苗子	194
云雾茶	袁 鹰	197
冬日抒情	郁 风	199
冬至夜的梦	冯亦代	201
夕暮	周同宾	203
炉火	臧克家	205

大弥撒之思	韩少华 207
桥	曾敏之 213
安塞腰鼓	刘成章 218
布达拉宫之晨	秦文玉 220
山城水巷	黄宗江 228
秋天我在泸沽湖	于 坚 231
睛窗札记	郭 风 235
自己的夜晚	刘烨园 238
苏州赋	王 蒙 243
袁崇焕无韵歌	石 英 246
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 249
寻找姚元之	高洪波 260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265
在高高的书架下	孙 颸 268
到了珍珠港	吴芝麟 270
过不去的夏天	张 洁 275
琴声	江宛柳 277
在海边	斯 妤 282
怀念星空	唐达成 285
赋得永久的悔	季羡林 287
淡之美	李国文 292
怎一个“闲”字了得?	邵燕祥 295
蝶雪	穆 青 297
下雨的时候	筱 敏 300
清风白水	王充闾 304
享受高考	蒋子龙 309
毁画	吴冠中 314
腕上晨昏	柳 萌 316
从这里到永恒	赵 玫 321
接近世纪初	王安忆 328
笔直的阴影	素 素 335

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	严建平	345
地图上的中国	彭 程	347
家的概念	鲍尔吉·原野	350
雨后	周晓枫	354
春风刮过	张立勤	360
丢失的草地	冯秋子	365
扔掉的村庄	刘亮程	370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梁 衡	376
“非典”时期穿梭于两岸三地	龚晓庄	380
一九八二的故事	李 辉	387
山居心情	韩少功	393
寻亲记	王十月	405
和谐是一种艺术	熊召政	412
白雪红灯的年	迟子建	414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	铁 凝	417
废墟上的风筝	关仁山	423
我的长征,我的生命之歌	贺捷生	426
走,到西柏坡去	崔济哲	431
编后记	吴泰昌	441

把心交给读者

巴 金

前两天黄裳来访，谈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他听到“遗嘱”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篇或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小说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作了答复。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〇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江安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外面有什么人来，住在哪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刚刚住了两天，就接到中学校一部分学生送来的信，请我去讲话。我写了一封回信寄去，说我不善于讲话，而且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此我不到学校去了。不过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会经常想到他们，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小说家算得了什么，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我却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当他们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那我就很满意了。信的原文我记不准确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信送了出去，听说学生们把信张贴了出来。不到两三天，省里的督学下来视察，在那个学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说：“什么‘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什么‘你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什么‘在你们面前我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是瞎捧，是诱惑青年，把它给我撕掉！”信给撕掉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还打过小报告，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来，多写了二十多年的文章，当然已经扣

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①

话又说回来，我在信里表达的是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的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写作的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前，读者来信谈的总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苦闷以及为这个前途献身的愿望或决心。没有能给他们具体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这样地鼓励他们：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在回信里我并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说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对读者我是不会使用花言巧语的。我写给江安中学学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忆中出现。我至今还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会见的那些年轻读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动的声音，那么恳切的言辞！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读者，我同他们交谈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火热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说《春》的序言里说：“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

^① 徐某某可能表示“抗议”说：“我上面还有‘长官’，我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我也只是讲讲话，骂骂人。执行的是别人，是我下面的那些人。他们按照我的心思办事。”总之，这一伙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是四十年代的督学所望尘莫及的。

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序言里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这说明我多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啊!我后来在江安给中学生写回信时,在我心中激荡的也是这种感情。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

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选自《巴金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8 月版

愿化泥土

巴 金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一定对，甚至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1927年1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1979年4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到八点钟有人来敲门，我站起来，我又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像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象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

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任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干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我看见过人们受苦，看见过人们怎样通过受苦来消除私心杂念。在“文革”期间我想得多，回忆得多。有个时期我也想用受苦来“赎罪”，努力干活。我只是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杂念不曾消除，因此心灵没有得到净化。

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炼，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它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是严肃地、认真地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

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要经受一次考验。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过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我发觉自己在私心杂念的包围中，无法净化自己的心灵。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